

中国近代学术思想转型及其历史境遇^{*}

——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为例

何予明

(美)瑞德大学(Reed College)

摘要: 本文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1895-1913)为例,讨论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境遇性问题。文章的枢纽是王国维 1913 年为自己的《宋元戏曲史》所作的判语:“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这句话后来被普遍认为标志了中国戏曲研究新阶段的开端,即所谓戏曲研究的现代化转型的开端。本文围绕着此言之所出的相关历史过程,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节讨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学术机制变化之一端:报刊出版对学术思想与交流的日益显著的影响。对这个机制的考虑,有助于我们理解王国维戏曲观的前后变化。同时,王国维本人对当时学术景观的变化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第二节即就此展开论述,并重点阐发王国维早期学术思想中的“世界学术”观。第三节讨论京都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进展及其戏曲研究的权威性的形成,认为:在王国维不断地尝试在新的学术交流条件下与世界进行对话、并致力于一种“世界学术”的建设时,他在 1910 年代的遭遇却说明,域外的学术界却在寻找一种中国本土的声音和学术权威。而这种寻找,成为对他的戏曲研究进行学术定位的关键。

关键词: 近代中国;学术思想;转型;历史境遇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5)03-0108-06

作者简介: 何予明,男,(美)瑞德大学副教授。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中,学者们常常将中国现代戏曲研究的始作俑者追溯到王国维(字静安,1877-1927)。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王国维戏曲研究中所体现的学术转型?对此,学者们已就王国维的学术体系本身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力图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即: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境遇性。通过追述王国维学术思想和研究的历史处境,包括他对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的理论探讨,特别是他的戏曲研究所反映出的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旨在探讨个人、国家、民族、世界学术环境和个人学术追求之间的缠绕关系,以及这种缠绕关系在学术建树的形成和定位中的作用。

一、近代报刊与王国维的戏曲观念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发旨废除学会,并关闭了一些报馆。这个诏令从反面反映了报刊出版作为新的思

想传播渠道对政治生活上的强大的、甚至是威胁性的冲击。中国近代戏曲观念的转变及戏曲研究的发展,即是近代报业通过对新思想、新信息的广泛传播来影响学术思想走向的一个例子。在王国维发表他的戏曲研究之前,不少报刊已对中国戏曲进行了有相当深度的讨论。这些报刊包括《二十世纪大舞台》、《月月小说》、《新民丛报》、以及《芝罘报》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学术思想日益受到世界性的影响,从而经历着一种转型性的变化。戏曲作为学术讨论和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日益世界化的思想氛围中也被重新审视:在一种世界性的视界中,被作为民族文化史的一部分来重新认识。王国维的戏曲观的形成和改变,即是这一思想过程的一部分。

学者们常常注意到王国维对中国戏曲的评价的前后转

* 收稿日期:2005-01-18

变。在他 1907 年的《自序》中,王国维谈到:

……近年……因填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过于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与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尚不能以道里计。^{[1](P612-613)}

在这段文字中,王国维认为中国戏曲是“幼稚”、“拙劣”、乃至是“最不振者”的。这种批评意见与他后来在《宋元戏曲史》中表达的意见正相反: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彩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2](P3)}

这种赞许的意见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也得到了表述:

……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则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3](P31)}

在上述两段话中,本来被王国维认为是“拙劣”和“最不振”的元曲,成为可与世界著名悲剧想媲美的文学。对王国维前后意见的改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王国维对中国戏曲有了更深认识后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王国维 1907 年对中国戏曲的批评是他早期不成熟的意见的表达;此后,随着他的戏曲研究的逐步深入,王国维修正了他早期的意见。

这种解释不无道理。不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王国维这两种意见的产生,其实都与当时报刊所传播的思想信息有关。^①也就是说,对王国维的戏曲观的理解,不能脱离对当时报刊中所反映的戏曲观念的考虑。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有:无涯生的《观戏记》(1903)、蒋观云的《中国之演剧界》(1904)、陈佩忍的《谈戏剧之有益》(1904)、渊实译著的《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发展之关系》(1905)、以及报癖的《论中国之传奇——译者曰》(1908)等。^②这些文章的执笔者,似乎都是有留洋经验之人,或至少是熟悉境外文化之人。

其中一些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戏曲是拙劣而象征着古旧、落后的中国的。比如,《中国之演剧界》的作者蒋观云如是说:

吾见日本报中屡抵诃中国之演剧界,以为极幼稚蠢俗,不足齿于大雅之数……方今各国之剧界,皆日益进步,务造其极而尽其深。而我国之剧,乃独后人而为他国之所笑,事虽小,亦可耻也。^[4]

《观戏记》也将日本戏剧与中国戏剧加以对比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上文中,蒋观云转用了日本报界对中国戏曲与演剧的批评态度,并进而为中国戏曲的所谓“蠢俗”而汗颜。这样,中国戏曲既成为中国“后人”的表征,同时也是中国“后人”的原因之一。在这种逻辑下,好的戏曲创作与演出

就成为提高民族形象、增强民族力量、开发民智、从而“震东岛而压倒西欧”的工具。^{[4](P96)}比如,《观戏记》的作者如是说:

曲本者……即国之兴衰之根源也……中国不振兴则已,欲振兴可不于演戏加之意乎?加之意奈何?一曰改剧本,二曰改乐器。^{[4](P72)}

在这种思想舆论影响下,王国维早期对中国戏曲的批评就不能被认为是单纯地由于他对中国戏曲缺乏深入研究所致。比如说,王国维在他 1907 年的文章中所用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幼稚”、“拙劣”、“不振兴”等,都与上述报刊文章非常一致。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王国维早期的戏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报刊出版业的影响。

尽管中国戏曲作为一种活跃在舞台上的艺术形式,在上述谈到的报刊文章和王国维的早期文章中被加以否定,但在另外一些文章,特别是一些研究性著作中,中国戏曲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处理。具体地说,尽管从当时中国报刊的报道来看,日本大众和媒体对中国演剧的所谓“幼稚”和“拙劣”“嘲骂甚多”,^{[4](P30)}但与此相反,一些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则将中国戏曲作为值得称许的东亚文明的一部分,而赋予中国戏曲一种历史成就感与神秘感。其中被译介给中国读者的,有这样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渊实译介的《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发展之关系》和报癖翻译的《论中国之传奇》。其中报癖如此兴奋地谈到他对日本学者对中国戏曲的高度评价的反映:“余译是篇竟,不觉喜上眉。余曷为喜?喜祖国文化之早开也。”^{[4](P95)}如此看来,王国维后来对中国戏曲的高度评价,也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报刊的影响。

也就是说,从 1907 年到 1910 年代,由于王国维审视中国戏曲的角度与论述方式的变化,使得他延续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报刊所传播和反映的戏曲观念中的不同线索。1907,王国维接受的是视中国戏曲为中国不发达之象征的观念,并进而对其持批评态度;此后,王国维则将中国戏曲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来研究,从而在其历史发展中找到了一种民族文化精华的体现。而此时王国维建立其突破性的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是王国维对戏曲的重新定义:

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2](P99)}

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2](P34)}

王国维的戏曲定义将中国传统戏曲之“曲”与西方古典戏剧

^① 关于当时报刊中反映的戏曲观,参见焦尚志《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中第一章对此的讨论。

^② 均收于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观戏记》一文作者,阿英《晚清小说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具“失名”。“无涯生”为此文作者,见焦尚志《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史》第 12 页。

之“剧”结合了起来;在此基础上,王国维发现了他所称之为的“真正之戏剧”和“纯粹之戏剧”,也就是元曲。

从某种程度来说,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反映了来自境外的对中国本土艺术形式的理解和评判在中国本土的回响。这不仅表现在日本媒体和学者的意见通过中国报刊的传播而对王国维的影响,也表现在王国维对西方“悲剧”和“喜剧”的概念的采用:

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2](P106)}

这种引用,同样地也可以在20世纪初的报刊媒体中找到反映。如蒋观云就在《中国之演剧界》中如此宣传悲剧的价值:

拿破仑好观剧,每于政治余暇,身临剧场,而其最所喜观者为悲剧。拿破仑之言曰:“悲剧者,君主及人民高等之学校也,其功果概在历史之上。”又曰:“悲剧者,能鼓励人之精神,高尚人之性质,而能使人学为伟大之人物也,故为君主者不可不奖励悲剧而扩大之。夫能成法兰西赫赫之事功者,则由坤纳西(Corneille)所作之悲剧感化之力为多……”……吾见日本报中……又曰:“中国之演剧也,有喜剧,无悲剧。每有男女相慕悦一出,其博人之喝彩多在此,是尤可谓卑陋恶俗者也。”^{[4](P150)}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悲剧也正是日本观众所认为中国演剧传统中所缺乏的。这种以悲剧作为衡量演剧传统之标准的最彻底的反映,恐怕就是“大团圆”结局在这一时期开始变得臭名昭著这一事实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对王国维来说,元曲应被理解为是一种完全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汉文化产品这一点非常重要。他特别声明:

吾辈宁谓辽金之剧,皆自宋往,而宋之杂剧,不自辽金来,较可信也。至元剧之结构,诚为创见;然创之者,实为汉人;而亦大用古剧之料,与古曲之形式,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2](P139)}

这样,在王国维的构架中,元曲就成为一种完全本土的文学和戏曲样式,一种能与西方美学传统价值相比较、相抗衡的中国(这里指汉文化)艺术传统。

综上所述,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受到了来自日本和西方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报刊出版。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其论述中充分肯定并承认了西方美学对他的影响;但对日本学者和日本媒体对其戏曲观的影响则倾向于只字不提。这种对西方和日本影响的不同态度,与下文论述的王国维对当时世界学术图景的认识和态度是分不开的。

二、王国维的“世界学术”观

中国近代社会在经历着接二连三的变化、危机、变革、

与革命的同时,中国近代思想也经历着同样的危机与冲突。而思想的危机,则不仅来自社会的动荡和变化,也来自一种如何认识这种动荡和变化,如何在动荡和变化中找到一种秩序感的思想过程。当中国在境外成为一个新的、不断发展的研究学科(比如西方的汉学(sinology)和日本的支那学(shinagaku))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在对境外文化进行着不同层面和角度的探究、界定、普及和争论,并将其纳入新式学堂的教授内容中。同时,这个对境外文化的译介和研究的过程,也深深地关注于对自身本土文化和学者个体身份的审视。

学术思想作为近代历史经验的重要部分,经历了知识领域和思想体系的重新构建。王国维作为中国近代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思想的讨论,对我们理解近代学术转型有着启发性的意义。从其早年的研究兴趣开始,王国维就深深地受到境外思想的影响。他很早即为“新学”吸引,并在其后到了新学的发源地上海,任职于著名的《实学报》;随后又就学于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并从此与罗振玉建立了长期的个人和学术上的合作关系。在东文学社,王国维学习了日文和英文,接触到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为他最终成为向中国译介德国哲学的第一人奠定了基础。

王国维这一时期的一个写作特点是其中文与外文(包括英文与德文)的并用,体现了梁启超(1873-1929)提倡的“新文体”的一些风格。王国维兼通中西文学的修养,在他的译文中也有充分的展示。比如他对拜伦的诗歌的翻译,即采用了楚辞的形式:

To feel me in the solitude of kings without the power that
make them bear a crown 余岑寂而无友兮羌独处乎帝之庭冠
玉冕之崔巍兮夫固 而不能胜^{[1](P46)}

这种跨语际的(translingual)文学研究活动,将王国维作为学者的身份定位在中外交流与互动的学术思想空间里。^①这一点,王国维在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存在着一种宇宙中共通的、世界性的学术思想:

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所不得解也。其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同此宇宙,同此人生,而其观宇宙人生也,而各不同。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也。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勿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11](P527)}

王国维在这里认为,世界学术的基础是世界通有的“知力”和“苦痛”的经验,以及对宇宙性的“人生之问题”的解释的欲望。在这种观点指导下,王国维认为中国学术界的当务

^① 关于中国二十世纪的跨语际文学实践,参见刘禾(Lydia Liu)《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译入之现代性——中国,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美)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

之急不是生“彼此之见”，而是去“破”这种“中外之见”，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之发达。与此相关地，王国维在这一时期也大力提倡经由对西方人文思想的介绍而创造出一套新的学术术语。^{[1] (P527-534)}

这里需要指出，王国维对世界学术图景的描述，既为中国学术之“发达”提供了发展空间，但又暗含着中国学术尚未发达之危机感。这一点，王国维也曾明确提出：“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 selfconsciousness 之地位也。”^{[1] (P529)} 笔者并不认为这种置中国学术于劣势的观念反映了王国维学术思想中的一种稳固的意识。但同时，笔者认为这种意识（甚至有时是潜意识）有它深刻切实的心理上和学理上的作用。这种作用之一，是修辞上造成的引进西方文化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这种修辞上的作用，使得王国维成功地将学术建树和使命牢牢地建立在中外交流，特别是在对西方文化进行译介的迫切需要之上。而王国维本人作为学者，这个时期的学术实践活动也是围绕着西学与中学的交流，特别是对西学的译介、引进、和引用来进行的。这一点，在他的学术论著中体现颇多。这里笔者仅举他对张之洞的学堂章程的批评这个例子。

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和其同仁认为，若失去中学这个“体”，就会“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5] (197-100)} 所以张的学堂章程强调“学经”的重要性，具体课程则包括学习《尚书》、《毛诗》、《春秋三传》、《周礼》和理学。王国维认为，这种课程的设立有“根本之误”，那就是缺乏西方哲学方面的课程。在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具体提出大学堂的经学科要设立“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心理学”、“伦理学”、“名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外国文”。（这其中大部分的课程，王国维都在南通师范学校教授过。）在理论上，针对将体用、中西对立起来的观念，王国维提出：

……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1] (1647)}

这里，王国维明确提到了“世界学术”这个概念，并强调光大“我国”学术之人，必为“兼通”之人。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透露出：在这种破彼此之见的中外交流中，日本只是起到了一个中国和西方交流的中介的作用。王国维是这样论述日本在世界学术交流中的位置的：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语言输入之意味也……数年以来，形而上学渐入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新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1] (1530)}

日文中的汉字(kanji)对西方术语的译介对近现代汉语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王国维本人对康德和叔本华的研究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文中的译介。也就是说，尽管王国维没有明确承认日本学术思想界对他的直接影响，实际上后者

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恐怕也不是一个“驿骑”所能概括的。而这正是本文下一节所要讨论的重点。

三、“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

这里重点讨论王国维成为中国现代戏曲研究的始作俑者时的历史处境。而对这一历史处境的讨论，我们还是要从罗振玉(1866-1940)谈起。

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关系久而密切，同时也有不少复杂的、不为外界所确知的内幕和分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罗、王相识之初，是罗振玉发现了王国维的才能并将其纳入自己庞大的政治、文化、及学术网络中的。众所周知，从一个地方上的学者到清廷重臣、到成为清廷对日政治、学术外交的要员，罗振玉渐渐地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学术上资本，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际网络。^① 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的，是罗振玉1909年第二次代表学部到日本考察新式高等学校之行，因为这次访问为此后王国维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作了铺垫，并进而奠定了王国维在中国戏曲研究中的地位。

罗振玉这次旅行，不仅访问了日本第一所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以下简称东大)，而且访问了日本第二所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以下简称京大)。京大虽然不像东大那样处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前沿，但却在日本与清朝学部的交流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罗振玉此行一年之后，京大的教授们，其中包括狩野直喜和著名的内藤湖南，被日本文部省派往中国调查、寻访敦煌遗书。在这次访问中，狩野直喜见到了王国维。这时，王国维已在北京任学部总务行走和学部图书局编辑四年，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戏曲选集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大部分的戏曲研究成果即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其中包括：《曲录》(1908)、《戏曲考原》(1909)、《宋大曲考》(1909)、《优语录》(1909)、《录曲余谈》(1909)、和《古剧角色考》(1910)。不过，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戏曲研究奠基石的《宋元戏曲史》是直到1913年王国维旅居日本时才完成的。

狩野直喜在写到他与王国维在1910年的会面时说：“恰巧王静安君和我都在步入这同一方面的研究，且当时他已完成了《曲录》与《戏曲考原》的写作，我便利用这次在北京淹留的机会与他会面，听他谈元杂剧的研究，觉得很有意

^① 罗振玉的网络延伸广泛，有地方士绅如邱于蕃、李越缙，出版家如汪康年，朝廷重臣如张之洞、端方、刘鄂，甚至皇帝本人溥仪。这个网络也包括境外人士如日本学者、官员菊池大麓，以及欧洲及美国的汉学家。在机构创建方面，罗振玉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日文学堂东文学社，同时也参加了南洋公学、江苏师范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建校工作，并曾到日本考察新式高等教育制度。在报刊出版方面，罗振玉建立了农报馆，出版了《教育世界》和《国学丛刊》。就学术史而言，罗振玉的网络，其功用可补充、替代、甚至超过当时的一些学术机构的作用。

义。”^{[6] (P39)} 这些话表明,虽然当时王国维还没有被认为是中国戏曲研究的权威人物,但狩野直喜对王国维的戏曲见解的尊重态度,已反映出王国维一定的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是与王国维作为一个中国本土同行的地位有关的。

狩野直喜回到日本之后,向他在京大的同事和学生介绍了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成果。而正是他对王国维的介绍,奠定了王国维在日本汉学界(特别是戏曲研究领域)的地位。

狩野直喜的很重要的一项学术成就,即是在院系建设中的作用,以及他对建立一种新的汉学传统的贡献。比如,他直接参与了支那学会和京都文学会的建立,以及《艺文》的出版活动等。王古鲁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以及乔舒亚·佛革(Joshua Fogel)的《政治与汉学:以内藤湖南为例》(Politics and Sinoogy: The Case of Neito Konan)均提到京大与东大比起来,有着非常不同的、也更为浓厚的汉学研究传统。^[7] 这是与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当然,这个传统的建立,也与京大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密切合作有关,这其中就包括京大教授与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合作与交流。

京大和罗振玉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学术性的。罗振玉与清朝皇室关系密切;而京大与文部省的关系也很密切。在罗振玉与京大教授的会面中,常有政治人物的出席。而罗振玉作为清廷和日本政治势力之间的一个桥梁人物,也在伪满洲国的建立上起到过作用。所以总结来看,王国维1911年到达京都时的历史环境是复杂的:一方面京大教授如狩野直喜正致力于建立强大的、有京大特点的中国学传统,另一方面京大、清朝学部、日本文部省之间又关系密切且微妙。在这种情形下,当王国维到达京都时,不仅饮食起居得到照顾,而且也受到了京都学者的热情尊重的接待。在这种氛围中,王国维很快地改写了他的《古剧角色考》,以供铃木虎雄翻译成日文并随后发表在《艺文》上。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① 盐谷温如此描述王国维旅居日期间对日本学界的巨大影响(译文出自孙良工):

……然而在我国(指日本)从来汉文与唐诗底研究虽非常盛行,至于宋词与元曲底研究却付等闲。我国的词曲研究者前有田能村竹田,后仅先师森槐南博士。竹田编《填词曲谱》且自作词;槐翁少年之作有《补天传奇》、《深草秋》等之曲;被称为比较清儒黄遵宪是具体而微的,又曾在大学编了词曲底讲义。到了近年,中国本国也曲学勃兴,曲话及传奇底刊行不少,吾(著者)师长沙叶焕彬先生及海宁王静安君同是斯界底泰斗。尤其是王氏有《戏曲考原》、《曲录》、《古剧角色考》、《宋元戏曲史》等有益的著述。王氏游寓京都时,我学界也大受刺激,从狩野君山(即狩野直喜——笔者注)博士起,久保天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亡友金井君等都对于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底研究吐卓学,或竟先鞭于名曲底介绍与翻译,呈万马骈辘而驰骋的盛况。^{[8] (P170-171)}

盐谷温的这段话,不仅表达了日本学者对王国维的学术权

威和贡献的称许,而且也透露出王国维戏曲研究权威之建立的复杂过程。首先,这段文字提到,近代对中国戏曲的重新认识和研究,在王国维的研究之前即已出现(如日人田能村竹田)。其次,这段文字再次证实了狩野直喜在王国维的学术地位及影响的建立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尽管盐谷温承认其他学者对中国戏曲也有深入研究(比如他的老师叶焕彬),但他最终是将王国维置于最权威的地位的。于是,王国维戏曲研究的权威性,就这样在日本学者中建立起来。从某种角度来说,盐谷温的这段话既是王国维戏曲研究学术定位的见证,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换言之,日本学者(如狩野直喜)在与中国学者交流中对本土权威声音的寻找,在王国维戏曲研究权威的建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在王国维为他的《宋元戏曲史》写下“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的序言时,还有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他和青木正儿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他们之间的分歧。如前文提到的,在王国维到达日本的前一年,青木正儿就已经完成了他的有关元曲的毕业论文;在王国维旅居日期间,青木正儿正在继续他的中国戏曲研究。在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的自序中,青木正儿回忆到: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余始谒王先生于京都田中村之侨寓。其前一年,余草《元曲研究》一文卒大学业,戏曲研究之志方盛。大欲向先生有所就教,然先生仅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且此时先生之学将趋金石古史,渐倦于词曲。余年少气锐,妄目先生为迂儒,往来一二次即止,于今悔之。^{[9] (P1)}

上述文字中所流露出来的些许不愉快,是日本学者所记载的与王国维的交往中罕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王国维与青木正儿之间的分歧,一定程度上是学术观点上的分歧:王国维重视的是戏曲文学,青木正儿则更强调戏曲音乐和表演。他们代表了中国戏曲研究的不同方向和分支。换言之,王国维和青木正儿之间似乎有一种门户之见。王国维旅居日本时,青木正儿正致力于对中国戏曲的集大成式的研究,而这又是王国维截止当时的学术著作所仍未体现的。就王国维当时的学术处境而言,一方面是狩野直喜等的极力推崇,另一方面又面临着青木正儿的不同学术见解乃至挑战,王国维在1912-1913年间仅仅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宋元戏曲史》这部专著,并自序曰:

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供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王国维这段对自身的学术评价,多被后人用来说明和证明这样一个学术史的观点:在中国近代新的学术环境中,王国维成为中国现代戏曲研究的开创者。如果说这种观点有道理的话,本文的主旨即在说明这一学术定位的过程的复杂

^① 此书日文题为《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东京:大日本雄辩会,1919)。

性。从历史上来说,王国维戏曲研究的学术定位是与近代的国际学术环境紧密关联的。这种新的学术环境使得学术研究不再受国境和语言的限制,甚至有时不得不在一种国际和跨语际(translingual)的环境中进行。具体来说,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是与日本(特别是京都学界)20世纪初的思想文化产生机制有关的:这种机制既激发了对中国本土的权威声音的需要和寻找,同时也借力于这一声音来支持自身的学术建设。

对于王国维来说,其学术生涯则似乎包含了一种反讽:他最初认为只有通过“兼通世界学术”才能在一种新的世界性的学术领域中“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并在实践中致力于对康德和叔本华的译介;而他最初对世界学术领域的想象,是以中国和西方为主要参与者的。但在1910年代,他直接身处的所谓世界性学术领域,却是不为他早年学术思想所青睐的日本学界;而他在这种领域中所最被称道和尊崇的,也与他早年学术追求相反,是他作为中国本土的学者对本土的一种艺术形式的研究。换言之,在王国维不断地尝试在新的学术交流条件下与世界进行对话、并致力于一种“世界学术”的建设时,他在1910年代的遭遇却说明,域外的学术界却在寻找一种中国本土的声音和学术权威。无怪狩野直喜回忆说,每当他提到王国维早年所倾心的西方哲学,王国维总是报以“苦笑”,并声明他不懂西方哲学。^{[6] (P44)}王国维的“苦笑”是一种象征: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国维既是19世纪末20世纪之交的新的学术研究环境的受益者,也对这种学术环境中的复杂性有其无奈。

总结来说,王国维戏曲研究的例子说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转型中群体学术走向和个体学术地位的确定,是一种跨国境、跨语际的多种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是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经验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卷三[M]. 上海:上海书店,1983.
- [2] 王国维. 王国维戏曲论著:宋元戏曲考等八种[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 [3] 王国维著,滕咸惠注. 人间词话新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81.
- [4] 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5]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Z].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 [6] 狩野直喜著,笔者译. 忆王静安君(《王静安君在+意+》)[J]. 艺文,1927,(8).
- [7] 王古鲁. 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M]. 上海:生活书店,1936; 乔舒亚·佛革(Joshua Fogel). 政治与汉学:以内藤湖南为例(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enan)[M]. (美)麻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
- [8] 盐谷温著,孙良工译. 中国文学概论[M]. 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69.
- [9] 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 中国近世戏曲史[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The Transform and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f Academic Thinking of Modern China

—Taking Wang Guowei's Study of Drama for Example

HE Yu-ming

(Reed College, the USA)

Abstract: Taking Wang Guowei's study of drama for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form and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f academic thinking of modern China. The pivot of the paper is what Wang Guowei mentioned in his *The History of Drama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study of drama begins from me", which later is widely accept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of drama in China, namely,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ransform of the study of drama. Three aspect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on how Wang Guowei's remarks came into existence. In part one of the paper, one of the changes of academic system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s discussed: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o academic thinking and academic exchange. Consideration to this system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Wang Guowei's drama thought. At the same time, Wang Guowei himself also gave a theoretical account to the change of academic situation of that time. Part two mainly illustrates "Universal academic"—Wang Guowei's early academic thought. Part thre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ang Guowei's drama study and the formation of its authoritative under the cultural circumstances in the capital. A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while he was trying to make dialogue with the world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of academic exchange, and was devoting himself to "Universal Academic", what he encountered in the 1910's showed that the foreign academic world was also trying to find an authoritative voice from China. This search played a key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academic position of Wang Guowei's drama study.

Key words: modern China; academic thinking; transform;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